



沂蒙文化 若干专题研究

王厚香 汲广运 著

YIMENG WENHUA RUOGAN ZHUANTI YANJIU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沂蒙文化 若干专题研究

王厚香 汲广运 著

YIMENG WENHUA RUQGAN ZHUANTI YANJIU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沂蒙文化若干专题研究/王厚香, 汲广运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209-09743-7

I. ①沂… II. ①王… ②汲… III. ①文化史—研究—山东省 IV. ①K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7535号

沂蒙文化若干专题研究

王厚香 汲广运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239mm)
印 张 22.75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
ISBN 978-7-209-09743-7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沂蒙（或称沂蒙山区）是指沂河流域和蒙山山系所经地区的总称，包括临沂市的三区九县和周边省市的部分地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

沂蒙文化是以沂蒙山区及其辐射地带包括沂沭河流域全境为依托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它自远古时期即已萌芽，东夷文化是其发展的源头，后来经过古代长期的孕育、沉淀、丰富发展，形成了源远流长、兼容并蓄、经世性强和与时俱进等特点。沂蒙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远古时期，沂蒙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东夷文化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考古学序列。从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经沂沭河细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时代，一脉相承。新石器时代，从北辛文化（距今约 7300 ~ 6100 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 6100 ~ 4600 年），到龙山文化（距今约 4600 ~ 4000 年），序列分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在夏、商、周时期，东夷文化在与夏、商、周文化的碰撞、交流中逐渐融合统一。秦朝的建立者是东夷领袖伯益的后裔，秦文化既继承了东夷文化的优秀之点，又汲取了西戎部族的尚武雄强，秦朝的建立与统一，标志着东夷文化已完全融入多元一体的中

华文化之中，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秦汉时期，沂蒙是山东的经学重镇。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批造诣较深的儒学经师的涌现。西汉时期出生于沂蒙并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儒学经师有兰陵人王臧、缪生、孟卿、孟喜，以及孟卿弟子后苍、疏广等。孟喜独创的“孟氏易学”，在当时影响很大。后苍为东海郡郯（今郯城县）人，著《后氏曲台记》数万言。后苍亦广授弟子，其中有戴德、戴圣，二戴各有著作传世，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后苍亦精《诗经》，是《齐诗》最早的传人之一。王吉，琅邪王氏迁居沂蒙后的第一位著名人物，通晓五经，尤精《春秋》《论语》。疏广与侄疏受曾于汉宣帝时分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时人以为荣。东汉时沂蒙籍的著名儒生有王良、伏湛、承宫、卫宏等。这些名儒或在地方，或在中央对儒学的研读、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儒学教育的发展极为可观。东汉时，沂蒙地区的郡、县、乡较普遍设立官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儒学教育得到很大发展。除官学外，私学中的儒学教育亦很发达。沂蒙籍著名经师，皆设帐授徒，传授儒家经典。如孟卿广招门徒，悉心传授。后苍举办私学，教授弟子多人。王良在王莽执政时，不愿做官，回家授徒讲学，先后有弟子1000余人。伏湛亦曾立私学，有弟子数百人。另如，姑幕（其地今属沂水县）人徐子盛，以《春秋》教授弟子数百人。杜扶（今郯城人），精研《韩诗》，居家教授弟子1000余人。一般儒生亦从教，所教或十余人，或数十人不等。

第三，儒学家族化现象普遍，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并累世官宦的儒学家族。如琅邪王氏家族、兰陵萧氏家族、琅邪颜氏家族、琅邪诸葛氏家族等，皆以儒学传家。以儒学传家和累世官宦的社会

现象，对沂蒙地区的历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沂蒙大族与流民纷纷南下，沂蒙地域文化开始了与南方的吴、荆襄、蜀、南中等区域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例如，东汉末年，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迁居荆襄，成为刘备集团的军师，协助刘备进驻益州，三分天下，建立了蜀汉政权。诸葛亮秉承琅邪文化的主旨，以儒为主，儒法并用，严明赏罚，以法驭下，使蜀地的政治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

在东晋初立、诸事草创的时刻，王导仍不忘设立学校，传播与交流儒家文化。他把沂蒙地区自先秦以来研读儒学的风气，推广于江南地区。除王导外，重视儒学传播与交流的祖籍沂蒙的人物还有王弘（379~432，刘宋宰相）、颜延之（384~456，刘宋湘东王师、金紫光禄大夫、文学家）、王俭（452~489，南齐宰相）、萧衍（464~549，梁武帝）等。由于这些人的努力，使南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获得了新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王导导演的以司马睿“上已观禊”为契机的南北士族联合，王氏家族对于司马政权的尊崇和拥戴，深刻影响了江南地方势力，也影响了江南文化，最终实现了南北士族的联合，从而巩固了司马睿集团的统治，为汉族统治中心成功转移南方做出了表率和贡献。这对于保护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这是一次以沂蒙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儒家政治文化向南方的传播与交流。

在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领域中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书法领域，沂蒙书法艺术向南方的传播与交流，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羲之及其父辈的王导、王廙，晚辈王献之、王珣等。在这个交流过程中，王羲之成为备精诸体、超越前人的书法艺术宗师，开创了一代书风，并影响久远。在文学创作方面，在南朝文坛上，

形成了沂蒙籍文学家群体，如“元嘉三大家”中的颜延之、鲍照；“竟陵八友”中的王融、萧衍、萧琛；还有东海三何：何逊、何思澄、何子朗；东海徐氏的徐勉、徐悱、徐摛、徐陵，还有琅邪王氏、兰陵萧氏、琅邪颜氏的若干后人。这些文学家在文学创作领域中与南方文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史学领域中，南渡的沂蒙士人及其子孙撰写出了一大批著作，如王韶之的《晋纪》，萧子显的《后汉书》《南齐书》，萧子云的《晋书》，萧衍的《通史》躬制赞序，徐广的《晋纪》，王智深的《宋纪》等。在目录学方面，亦取得一定的成就。在科技方面，南渡的沂蒙士人亦有一定建树，如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何承天的《元嘉历》，徐之才的医药学等，都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科技的发展。

沂蒙地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成为山东省和华东地区的核心，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更成为全省红色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全国红色文化的核心之一。

目 录

前 言	001
一、沂蒙文化的源头——东夷文化	001
二、蒙山和沂沭河流域的石器时代文化	038
三、沂蒙汉简和汉画像石	054
四、沂蒙世家大族的文化传承	089
五、沂蒙古圣先贤的思想文化	150
六、沂蒙家教文化和沂蒙孝文化	205
七、临沂古城和沂蒙特色饮食文化	237
八、沂蒙非物质文化遗产	268
九、沂蒙红色文化	305
参考文献	350
后 记	356

一、沂蒙文化的源头——东夷文化

东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其核心区域在沂蒙地区，是沂蒙文化的源头。

（一）东夷文化的范畴与内涵

东夷文化处于传说的上古时代，消融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中心活动区域在今天的沂蒙地区。

1. 东夷文化界说

“东夷”一名出现较晚，可能是在夏代，是与夏文化相对而言的。关于“夷”字的来源，一般认为，甲骨文中的“尸”字即后来的“夷”字。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多次征“尸方”，即多次征“夷方”。“尸”字经多次变化之后，才形成“夷”字^①。“东”与“夷”的连接在甲骨文中尚未见到，但在西周金文中已多次出现，只是“夷”字仍写作“尸”字。如：“惟周公征伐东尸”；“东尸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尸”；“惟王伐东尸”……同时，金文中还有“淮夷”“京夷”“秦夷”“南夷”等出现，“夷”字皆仍写作“尸”字。在“夷”字之前的“东”等字，是用以表示方位的。《礼记·曲礼下》中“夷”有“东方之人”的意思。《王制》篇说：“东方曰夷”。东汉许慎《说文》中也说：“夷，东方之人也。”东夷即东方之夷。这是夏、商、周统治者以其所居为中心而言的。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夷有九种。

^① 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在古代，九非实指，而是“数量很多”的意思。也就是说，东夷族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组成的庞大部族和部落联盟。

东夷文化的地理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傅斯年认为：“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在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包括辽东朝鲜的西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皞、少皞、有济、有穷、徐方诸部，风、櫻、偃诸姓，全叫作夷。”^①这一地理区域和《尚书·禹贡》所说的“冀州”“兗州”和海岱之间的青州、海岱及淮之间的徐州，以及淮海之间的扬州，大体上是一致的。在这些“州”域生活着的“鸟夷”，就是东夷。如童书业先生说：“盖鸟夷本指以鸟为图腾之部族。广言之，古代中国东部居民多以鸟为图腾，亦可称为广义之鸟夷。”^②

广义的东夷文化的大体范围，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狭义的范围，则是指泰山、沂山以南，淮河以北，蒙山南北，沂、沐、汶、泗河流域的远古文化。这一区域也可以说是整个东夷文化的中心区域。历史上的五帝及后来的夏商周的早期领袖人物都曾在这一区域生活与活动过。这个区域东部就是沂蒙地区，西部是曲阜、兗州一带。

沂蒙地区作为中心地带，同样随着东夷文化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并在战国兼并战争的发展中而逐渐融入统一的秦汉文化之中。

在东夷文化时期，沂蒙地区温暖湿润，雨水充沛，山岭被茂密的森林覆盖。这为东夷人提供了便利的生活环境条件。

2. 东夷文化的源头和发展

(1) 东夷文化的源头——沂源猿人

东夷文化是在沂蒙地区土生土长的文化，其源头是沂源猿人所代表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沂源猿人生活的地质年代为更新纪中期，考古学上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历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②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史学的分期则处于原始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即原始群时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一说三四十万），与“北京人”的历史年代相当。这是沂蒙历史的开端，同时也是东夷文化的源头。此外，在沂沭河流域还发现了沂水县南窟洞等30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说明，沂蒙地区在远古时代，有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发达的旧石器时代。这为东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2）东夷文化的发展序列

东夷文化揖别旧石器时代，即进入细石器时代。在临沂市沂沭河流域的河东区凤凰岭等地，发现了近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证明了这一地区游牧及畜牧业比前有了新的发展。

沂沭河流域细石器一般分布于离海平面较低的浅山丘陵、平原、低洼地区，其海拔高度一般在100~70米以下。这比沂源猿人时代的生活区海拔高度一般在300~500米，有了明显的下移，符合我国古人类的活动由山岭、丘陵，然后走向平原这一规律。

在新石器时期，东夷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繁荣。考古资料表明，在沂蒙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上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四个阶段。

夏、商、周的崛起，消磨了东夷文化的风骚，东夷族也不得不被裹挟进夷夏合流的浪潮之中，并在与夏、商、周的长期碰撞与融合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最终融入到了中华文化的洪流之中。

（二）太昊、少昊时代的东夷文化

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太昊、少昊时代。这一时期是东夷文化发展的兴盛和成熟时期。

1. 太昊、少昊时代

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是传说中的东夷族的先后相继的两位领袖。他们最早皆兴起于沂蒙地区，后来活动足迹遍布今山东省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一带。

（1）太昊在沂蒙

“太昊”又写作“太皞”，伏羲又作庖牺、宓羲等，为风姓之祖。太昊伏

羲氏是新石器时代兴起于沂蒙地区的一位东夷族领袖。

唐代司马贞综合各种古文献，补写《史记·三皇本纪》。关于太皞伏羲氏，其文曰：“太皞伏羲氏，风姓也。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宋代的《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践之，生伏羲氏。”这里都说因太皞母于雷泽践大人迹而怀孕生太皞，这与“玄鸟生商”和践巨人迹而生稷的传说一样，都是母系氏族时期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状况的反映。那么，雷泽究竟在何处呢？

关于雷泽的地望问题，目前有几种说法，其中一说在沂蒙地区。蒙山太平顶前，平邑县仲村镇回龙庙一带的沼泽区，现在仍名雷泽或者服泽。它位于浚河和泗水的上游，亦与汶河流域毗邻。最近几年，在雷泽的东、西、南三方的附近地区，都发现了若干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因此，该地是一个远古人文荟萃之处。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皞“作都于陈”，“陈，太昊之虚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称：“伏羲之东方民族，原始不必发源于洼下之濮阳”，“其源既明，他处如濮县、永宁各地，地名与泗水相同者，皆族迁名随，为羲族后徙所居，不能持此以为伏羲生长之乡也”。

从太皞伏羲氏的后裔分布情况来看，也可说明沂蒙地区是其最初活动之地。《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太皞血亲集团后来由沂蒙地区转而往西又往南，移入中原地区，在原活动地区留下了四个部落或者部族，其中之一者即颛臾。《论语·季氏》云：“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所谓“东蒙主”即主持蒙山的祭祀。为什么要祭祀蒙山？实际上这与“实司大皞”是一致的，因为蒙山为太皞肇始兴旺之地，故祀之。颛臾在春秋时期为鲁国附庸，其遗址在今山东临沂市平邑县城东20公里处。值得一提的是，隋朝建立后，曾于开皇十八年（598）在颛臾故地建县，即名颛臾县，属沂州，唐贞观初省入费县。1946年后为平邑县管辖。

太皞血亲集团的后裔蒙、牟、包等部族，皆在今平邑县境。

上述情况，无疑可以作为沂蒙地区是太皞伏羲氏兴起和最早期活动地区的

重要证明。

(2) 少昊在沂蒙

继太昊之后的东夷领袖是少昊金天氏。少皞或作少昊，名挚，号金天氏。《帝王世纪》曰：“少皞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即西陵国女螺祖），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意感而生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在位百年而崩。”这里是说，少昊是黄帝之子。其他历史文献未有此种记载，如《古史考》曰：“少昊以金为德，故号金天氏，或曰宗师太昊之道，故曰少昊。”

少皞亦曾在沂蒙地区活动，其后裔在沂蒙地区建立了若干东夷古国，著名的如郯国、莒国等。《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述郯子与鲁昭公的对话及孔子对该事的评论。当时鲁昭公问郯子少昊氏“以鸟名官”的事，郯子即回答：“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下面郯子还介绍了“以鸟名官”的具体情况。后来孔子听到此事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说明，少皞时的东夷族已具备了国家管理的雏形，其政治与文化都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最著名的少昊在沂蒙地区的历史记载。

2. 少昊集团的鸟图腾机制与组织结构

图腾崇拜是人类智力初开而又未能充分发展时的历史现象，摩尔根认为“图腾”一词源出北美印第安语，其本意是“它的亲族”。我国学者首先使用这一词语的是清末严复，其解释是“自别其众于余众”的氏族或者部族的“徽帜”。

鸟夷（东夷）与鸟图腾。《尚书·禹贡》中早有“鸟夷”之名，有“冀州……鸟夷皮服”，“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等记载。这里的“岛夷”应为“鸟夷”之误，或指居于海岛的夷人，也属鸟夷的一种。历代注家对“鸟夷”的注释，虽略有不同，但一般认为是指东夷之民。如《禹贡》郑玄注云：“鸟夷，东方之民。”

东夷之所以被称为鸟夷，就是因为他们的图腾崇拜为鸟。《左传》昭公十

七年记载郯子的话：“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从中可以看出，少昊就是鸟的说法，很可能就是图腾崇拜的遗传。

鸟图腾崇拜还表现在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造型及纹饰上，都具有鸟的特征。如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时期广泛出土的陶鬶皆为鸟型陶器，反映了当时人民对鸟的崇拜。

少昊集团以鸟名官。《左传》昭公十七年在记述郯子谈少昊氏“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之后，即讲述了以鸟命官的具体情况：

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祝鸠氏，司徒也；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鵙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

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这一段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少昊集团的组织机构及其机制的大体情况。其中五雉、九扈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官职的问题，杜预等注家作了补充说明。五雉即：鶡雉氏，为木工正；鶡雉氏，为陶工正；翟雉氏，为金工正；鶡雉氏，为皮工正；翬雉氏，为染工正。九扈即：春扈氏，促民耕种；夏扈氏，促民芸除；秋扈氏，促民收获；冬扈氏，促民盖藏；棘扈氏，掌人百果；行扈氏，昼为民驱鸟；宵扈氏，夜为民驱兽；桑扈氏农正，趣民养蚕；老扈氏，趣民收麦。五雉为五工正，以利器用，正度量，使人们在交易中做到公平无偏。《考工记》有“六工”之说。此处言五工，可释为五种手工工艺或五种手工业部门，这说明少皞时手工业已有相当的水平。

这样，在少昊集团中，在部落联盟酋长之下即形成一套管理网络：五鸟管理历正，即一年的主要节气及主要活动的安排；五鸠管民事；五雉管手工业事务；九扈主管农业生产。这实际上也就是国家的雏形。

这种以鸟名官的制度，实际是按不同氏族部落而分配的，五鸟、五鸠、五

雉、九扈都是不同的鸟类，分别是不同氏族崇拜的图腾，代表了不同的氏族，按氏族分配官职，是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特殊现象。每个氏族中担任官职的家族，又都是氏族的首领，其官职也是世袭的。当然，这种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是会逐渐改变的。

以图腾命官的制度并非只有少昊集团如此，其他部落联盟也有这种现象。如《后汉书·东夷列传》称：“以六畜命官，有马加、牛加、狗加。”说明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图腾名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3. 农耕文化与经济生活

太昊、少昊时期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辅以采集、渔猎，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以种植粟为主，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还有骨、蚌、角器等。家畜饲养亦较前有所发展。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已发现猪、狗、牛等遗骨，表明饲养业的存在。至中后期墓葬中，发现了较多的猪领骨。

渔猎仍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除属于家畜的猪、狗、牛、羊、鸡等之外，还有獐、狸、麋鹿、斑鹿，以及鱼、蚌等的骨骼。河东区大范庄遗址、莒县杭头遗址等地都出土扬子鳄骨片。这些动物应是在附近渔猎所得。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沂蒙地区可能气候湿润，森林茂密，雨水充沛，否则，是无法为这些水陆大型动物提供生存条件的。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手工业亦有了一定的发展。制陶仍是重要工业部门，早期和中期以手工制作为主，晚期开始采用轮制技术制造大型器物。

在石器制作方面，除生产工具之外，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礼器化的石器，如玉钺、石钺等，这是权力向个人手中集中的表现。

大汶口文化早期尚处于母系氏族阶段，中晚期已处于由母系向父系过渡的阶段，而晚期部分地区已处于父系氏族阶段，即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夜。

4. 信仰与习俗

太昊、少昊时期，沂蒙东夷先民的信仰主要是龙凤崇拜，英雄崇拜的观念亦已萌芽。太昊氏集团崇拜龙，少昊氏崇拜凤。《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的话：“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①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6~1387页。

关于太昊氏以龙名官一事，杜预注曰：“太皞，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服虔推测说：“太皞以龙名官，春官为春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①后之学者认为服虔此说是据阴阳五行说而作的臆测，并非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太昊集团崇拜龙则是历史事实。

以龙名官和以鸟名官蕴含着古代社会丰富的信息。其中一点就是显示了这两个血亲集团的思想信仰，即太皞集团以崇拜龙为其信仰，他们是龙的传人；少皞集团以崇拜凤为其信仰，他们是凤的传人。少昊氏以各种鸟名官，而凤为百鸟之王，少昊之立时，又“凤鸟适至”，故这一血亲集团总的信仰是凤。近代著名文学家闻一多早年曾说过：龙凤崇拜是“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②。事实正是如此。应该说，太昊、少昊集团对龙凤的崇拜是我国即将进入文明社会的前兆，因为它开创和建立了全民族统一的信仰。由于东夷文化的地理范围，并不仅限于海岱地区，在太昊、少昊活动与影响的其他地区也会有龙凤崇拜。当然龙与凤都不是实际存在的动物，都是典型化的形象，而这种典型化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

在葬俗方面，沂蒙地区与其他大汶口文化区域的葬俗基本相同。在兰陵县东高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中，发现了死者手持獐牙的习俗。专家认为，这种习俗可能表明死者生前为巫医，獐牙是其从事巫医的工具。

（三）“五帝”时代的东夷文化

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即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这一时代的东夷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 “五帝”时代的龙山文化

五帝时代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指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时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阶段。五帝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时代”。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注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7页。

^② 闻一多：《龙凤》，载《闻一多全集》第1册，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69页。

这一时期正是龙山文化时期。在沂蒙地区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很多，如沂水县的上流庄、沂源县的曹家庄、唐家沙沟，郯城县的大尚庄、河东区大范庄，罗庄区的湖西，兰山区的朱保、临沭县的北沟头、平邑县的铜石镇庄上及唐村乡洼子地、临涧小卓庄、莒南县的大店镇薛家窑等遗址。

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主要以粟、黍为主。渔猎仍占有重要地位。家畜饲养进一步发展，有猪、狗、牛、羊、鸡等。

龙山文化时期正处于氏族公社崩溃的前夜，文明社会的曙光即将显现^①。

2. “五帝”时代东夷部落的发展

进入父系氏族时期，社会组织不断发展扩大，由氏族发展而演变为部落，由部落而又形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之间或联合或战争，社会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民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在海岱文化区域内，当时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有蚩尤部、颛顼部、祝融部、帝喾部、虞舜部、皋陶部、伯益部等。其中虞舜部、皋陶部与沂蒙地区关系密切。

（1）帝舜部

舜出生于有虞氏，而按族系论，舜是帝喾的后裔。舜所在的氏族其图腾为骏鸟，骏鸟即赤雉。故此支当与少昊时代的“五雉”有血缘关系。《山海经·海内外西经》曰：“鼓亦化为骏鸟。”鼓即指舜父瞽瞍，此条可作为舜以骏鸟为图腾的证明。故早期传说中帝舜亦作帝俊。

舜最初活动于山东泰山以南、沂沭河流域，后又迁至今河南东部淮阳一带，继又迁至今山西河北南部一带，晚年迁于南方，卒于苍梧（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处，一说苍梧即在今山东境内）。《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有学者认为，孟子说的“诸冯”当为平邑县城西北的诸冯村及与之相邻的泗水境内姚（桃）虚。这恰恰是《墨子·尚贤》所说的“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的雷泽岸边^②，也就是舜之初都城址，后迁今肥城都君庄。以上诸说，尚需要考证，但不影响“舜是活动于古代沂蒙地区的东夷族领袖”

^① 参见临沂市政协编著的《临沂历史大观》中徐淑彬、张川的文章。

^② 《墨子·尚贤上》。